

论中国经济发展 中的政府主导及其弊端^{*}

张进铭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财政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而且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这表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但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长过快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影响中国经济转轨进程;政府管理成本(行政管理费)急剧增加,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腐败难以根治,等等。因而,我们应该加快政府改革的步伐,实现由经济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关键词: 经济发展 政府主导 弊端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启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又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实现了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政府本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始终扮演着经济发展主导者的角色。

一、政府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

(一) 国家财政收支迅速增长

1979-2005年,我国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1%,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9.6%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了3.5个百分点。其中,1990-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16.7%)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9.7%)高出了7.0个百分点。1998-2005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为8.9%,但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反而上升至17.6%,比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8.7个百分点。这就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0.3%,2000年上升到13.5%,到2005年又上升到17.3%。^①

1979-2005年,我国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5%,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了3.9个百分点。其中,1990-2005年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16.8%)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了7.1个百分点。而在1998-2005年,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7%,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了8.8个百分点。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为6823.72亿元,占当年GDP(60793.7亿元)的比重为11.2%;到2005年,国家财政支出增加到33930.28亿元,占当年GDP(183084.8亿元)的比重上升到18.5%。同时,由于财政支出始终大于财政收入,我国的国债也在迅速增加。1995年,国债发行量为1549.76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5%;到2005年,国债发行量达到6922.87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3.8%。^②

(二) 政府主导投资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来实现的。这一点从我国GDP的构成中明显地表现出来。2003年,我国家庭消费、政府消费、总资本形成(投资)以及商品和劳务的国外收支(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4%、13%、42%和1%;而美国这4个量占GDP的比重分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入WTO后我国政府作用和政府改革研究》(02CJL011)。

别为 70%、16%、18% 和 -4%，日本分别为 56%、17%、26% 和 1%，德国分别为 59%、19%、18% 和 4%，英国分别为 66%、20%、16% 和 -2%。同年，中低收入国家这 4 个量占 GDP 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61%、13%、24% 和 2%；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分别为：63%、18%、19% 和 0%；全世界的平均值分别为 62%、17%、20% 和 1%（WorldBank,2004）。这些数据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是最为重要的，而我国则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取代了家庭消费需求而成为总需求中的主导力量。

在这一时期，尽管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但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1990-2005 年，我国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 17.3%，比同期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了 7.6 个百分点。^③

上面这些数据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虽然我国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改革并且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在投资和经济建设方面的主导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如果我们把政府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看作是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份额的话，则从 1995 年到 2005 年，政府主导的经济占 GDP 的比重由 28.4% 上升到 34.4%。另外，如果再加上政府的预算外支出的话，则政府主导的经济份额就会更大。

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的主导下，我国经济实现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更加突出。

（一）“重投资、轻消费”增长模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需求是一个国家总需求中最重要、最稳定的需求，企业投资、生产的决策也是以满足家庭的需求为目标。因而，各国政府都非常注重国内的消费需求，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努力实现消费需求的稳定、合理增长。同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国的这种“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难以做到这一点的，而且还会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但同时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又得不到明显改善的话，则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并且对改革的支持也会不断下降。另外，从经济增

长本身而言，如果没有较高的、稳定的国内消费需求而必须始终依赖于大量投资的话，就会面临着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得投资大量减少的话，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迅速下降。

事实上，我国这种过度依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显露出较为严重的弊端。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内需不足”的状况。对此，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增加投资，以拉动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这就使得我国出现了上述与绝大多数国家截然不同的情况：投资取代了家庭消费而成为总需求中的主导力量。表面上看，由于我国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政府才不断地增加投资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经济资源，从而削弱了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

1995 年，我国的各项税收为 6038.04 亿元，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为 9.9%；到 2005 年，各项税收为 28778.54 亿元，是 1995 年的 4.8 倍，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上升至 15.7%。这就是说，1995-2005 年，政府的各项税收占当年 GDP 的比重增长了近 60%。其结果是，导致了广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1995 年，我国的工资总额为 8100.0 亿元，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为 12.7%；到 2005 年，工资总额为 19789.9 亿元，是 1995 年的 2.4 倍，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为 10.8%。同时，2005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10493 和 3255 元，仅为 1995 年这两项收入的 2.6 倍和 2.1 倍。^④可见，1995-2005 年，无论是工资总额还是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其增长速度都明显落后于政府税收的增长。

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引起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最终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下降。1995 年，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为 28369.7 亿元，占按支出法计算的（下同）当年 GDP 的比重为 44.9%；2005 年，居民的最终消费为 70906.0 亿元，占当年 GDP 的比重下降为 38.0%。^⑤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1995-2005 年，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由 44.9% 下降到了 38.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则由 31.7% 剧升至 47.5%。可以说，投资已经“挤掉”了消费而成为总需求中的主导力量。

（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不利于我国的经济转轨

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大量投资并控制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转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政府对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保持着很大的力度。结果，大量宝贵的经济资源继续“沉没”在对一些国有企业的低效、无效的投资中，而国民经济中急需投资而且能够产生更好的

经济或社会效益的其他产业或部门却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金。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关爱”正是导致我国市场化改革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因素:政府在国有企业、银行和政府的“铁三角”关系中始终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而且一直无法解脱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同时充当了改革的发动者和经济发展的主导者的角色。当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主导经济发展时,其在推进改革和经济转轨方面的作用就大大减小。不仅如此,在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会不自觉地动用自己熟悉的、计划经济时期常用的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倒退。例如,政府大量发行国债事实上造成政府和银行关系的变相复归。在计划经济时期,银行的地位相当于政府的出纳: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向银行支取。改革开放后,中央银行开始行使国家管理金融机构的职能,四大国有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转变,而且还出现了股份制银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向银行透支的现象大大减少。但是,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却使传统的财政、银行关系又出现复归的迹象。政府发行的国债主要由银行来购买,然后进入国债市场流通。近年来,由于实行严格的信贷制度,银行的存款贷不出去,经营发生困难,因而宁愿去买国债。这样,政府一旦缺钱就发国债,而银行购买国债既满足了政府的需要又符合自身的利益。结果,银行又变相成为财政的出纳。政府和银行这种关系的复归不仅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同时还增加了双方的风险:银行购买国债用的是广大居民的储蓄存款。

(三) 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急剧增加

在我国的国家财政支出中,政府的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各项目支出。1995年,我国国家财政支出为6823.72亿元,其中经济建设费为2855.78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1.9%;社会文教费为1756.72亿元,占25.7%;国防费为636.72亿元,占9.3%;行政管理费为996.54亿元,占14.6%;其他支出为577.96亿元,占8.5%。到2005年,国家财政支出为33903.28亿元,其中经济建设费为9316.96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7.5%;社会文教费为8953.36亿元,占26.4%;国防费为2474.96亿元,占7.3%;而行政管理费增加到6512.34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9.2%;其他支出猛增至6672.66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9.7%。这些数据表明,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国防的支出比重大约为76.9%,而行政管理

费和其他支出的比重仅为23.1%;到200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国防的支出比重进一步下降到61.2%,而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的比重则猛增至38.9%。如果我们把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简单地理解为政府管理的直接成本的话,则按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说,1995-2005年我国政府的管理成本增加了近70%。^⑥

另外,在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也在迅速上升。1996年,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支出为3838.32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为1490.23亿元,占38.8%;行政事业费支出为1254.36亿元,占32.7%。到2005年,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支出为4351.7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为287.28亿元,仅占6.6%,行政事业费支出迅速增加为3133.80亿元,占72.0%。^⑦

可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政府迅速地“富裕”起来。但是,由于在政府支出方面存在着预算的“软约束”,导致政府自身的“消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空前地增长,政府的管理成本急剧上升。例如,政府部门中的“公款吃喝”和“车轮经济”现象变得日益严重就是一个明显的体现。

(四)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家庭会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对其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实现利润极大化或效用极大化。这也是市场经济能够实现高效率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则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情况并不了解,因而其投资决策往往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极大化而会在决策过程中认真地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而政府的行为目标大都是追求自身的“政绩”,因而当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时,其投资决策往往比企业“大方”、“慷慨”得多。

近年来,在我国很多地方普遍流行的所谓“政府经营城市”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事实上,由于本身没有足够的财力,政府“经营城市”的办法大都是把国有土地、国有企业和原属政府管理的公共事业转让和拍卖出去,进行增值或赢利性运作。在通过这些运作获得大量收入以后,很多地方纷纷大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能源。更为严重的是,“经营城市”往往就是从农民手里廉价地获取土地,瓦解了失地农民的生存基础,加剧了农村的贫困,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另外,由于缺少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政府的一些决策往往取决于“长官意识”和“拍脑袋”,缺乏

科学性和民主性,结果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例如,由于当初缺乏科学论证和效益分析,四川省某市建设的一个机场在 2001 年竣工通航的当年就亏损 3800 多万元,并且还有 1 亿多元的工程款没有付清。据审计部门的调查,该机场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 2.2 亿元(柳晓森,2005)。又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本地的知名度或为本地企业的产品寻找出路,竞相以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举办各种“节”、“会”,或者斥巨资修建交易会会所。结果,2004 年浙江省出现了平均三天就有一个节的“盛况”。

最后,因为承担着主导经济发展的责任,各地方政府往往把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结果,“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大行其道,低效投资、重复建设层出不穷,不仅造成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五) 政府没有履行好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责任

很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有益的公共产品,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本身具有很高的社会收益但却只有较低的私人收益,因此私人企业一般不愿意提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承担提供这些产品的责任以确保、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道路、桥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且其效益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产生,因而市场本身也不会自动提供。因此,政府应从整个社会利益的角度考虑,对基础设施投资作出全面的计划安排。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方面,因而对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重视(但是忽视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的交通运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对于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政府在理论和认识上是高度重视的,但是在实际的投入方面却在不断地减少力度。这样就导致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大滞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教育方面,1995 年全国学费和杂费为 2012422.5 万元,到 2004 年猛增至 13465517.3 万元,为 1995 年的 6.7 倍。但是,同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却增长缓慢,且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1995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14115233.3 万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20.7%;到 2004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44658574.8 万元(为 1995 年的 3.2 倍),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28486.89 亿元)的比重为 15.7%,比 1995 年下降了 5 个百分点。而且,在这非常有限的教育经费中,有相

当数量是用于人数较少的高等教育,而人数众多的基础教育则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短缺。例如,2004 年,我国小学生人数为 11246.2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数为 1333.5 万人),但其全部教育经费仅为 18045650 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14731537 万元),明显少于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21297613 万元)。^⑧由于经费严重不足,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村小学已经到了举步为艰、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科技方面,1995 年,国家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为 302.36 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4.4%;到 2005 年,国家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为 1334.91 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3.9%。这表明,1995-2005 年虽然国家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不少,但是其在全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⑨

在卫生支出方面,1998 年,我国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为 587.2 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10798.18 亿元)的比重为 5.4%;到 2004 年,我国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为 1293.6 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4.5%,下降近 20%。^⑩

(六)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农业称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根本产业”。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却在不断地减少。例如,1978 年,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13.43%,1995 年这一比重下降为 8.43%,2005 年又进一步下降至 7.22%。也就是说,仅在 1995-2005 年,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就下降了大约 15%。在国家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三项科技费用、农村救济费)缓慢增长的同时,政府征收的农业各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却在快速增长。1978 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三项科技费用、农村救济费三项支出之和为 59.08 亿元,而农业各税仅为 28.40 亿元;到 2005 年,上述三项支出之和为 657.91 亿元,而农业各税增加到 936.40 亿元。^⑪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政府征收的农业各税一直都超过了其对农业的直接支出。

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政府不断减少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同时又大量地抽取农业剩余,才导致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4 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133.6 元,二者的比例为 2.57 : 1。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加上政府逐步放开了粮食的价格,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到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86.3元,二者的比例缩小为2.20:1。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粮食价格徘徊不前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上涨,加上各种税、费等名目繁多的负担,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在同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收入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样,到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83.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577.7元,二者的比例扩大至2.71:1。到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0493.0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3254.9元,二者的比例扩大为3.22:1。^⑩如果再考虑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因素的话,则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比例可能要达到5:1左右。

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是导致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1990年,我国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为6.4%,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为41.8%(世界银行,1999)。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7,其中,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下降到4.7%,而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进一步上升到50%(WorldBank,2005)。

(七) 腐败问题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腐败主要来自于不受制约的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目前,我国还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原有的制度和约束手段被削弱或放弃,而新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样就会出现一些制度方面的缺陷甚至是“真空”。这就为寻租和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就意味着政府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且还拥有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的权力。对于那些握有真正权力的政府官员,我们还没有非常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腐败分子就会通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各种方式大肆侵吞国家资产,谋取不义之财。

三、结论和建议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长期扮演经济建设和投资主导者的角

色,实现了GDP的快速增长。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这种政府模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大大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和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政府继续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甚至在某些方面已开始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我们应该加快经济转轨的步伐,确立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大力推进政府改革,尽快实现由经济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具体而言,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在目前就业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改变以前一味追求GDP增长速度的“见物不见人”的行为模式,把促进实现充分就业作为主要任务。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促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不应再是自己进行大量的投资或创办企业,而应该是通过建立一些有效的制度安排或政策措施来激发市场的活力,从而提高社会就业水平。实际上,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促进就业的增长,例如简化审批和办事程序以降低居民创办、经营企业的交易成本,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出台鼓励企业吸纳更多劳动力的政策,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对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工进行在职培训以提高其就业能力,等等。事实上,如果政府通过积极的努力实现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那么不仅经济可以很自然地实现快速增长,而且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上升,从而其消费需求随之增加。这样,整个国家经济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就业增加—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上升—消费需求增加—企业生产扩张—劳动力需求扩大—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路径,使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其次,严格控制自身支出的增长,并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增强公共服务的功能。毫无疑问,在政府为主导经济发展而掌握更多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功能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受到很大影响。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近年来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政府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急剧增加。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自身支出和管理成本的迅速上升。这些无疑加重了普通居民的负担,减少了其收入水平,引起了广大居民的强烈不满。为改变这种局面,政府应该严格控制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的增加,降低运行成本,减轻居民的负担,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惩治腐败,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同时,政府应减少对国民(下转第77页)

南非、韩国、墨西哥、印度和巴西 7 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其将为国外专利升值而每年多支付 24 亿美元。

③李平:《国际技术扩散的路径和方式》,载《世界经济》,2006(8)。

④Ginarte,J.C.and Park,W.G.,1997 .“Determinantsof PatentRights:aCross-NationalStudy.”ResearchPolicy,Vol.26, No.3,pp.283-301 .

参考文献:

1. 蒋殿春、张宇:《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载《世界经济》,2006(10)。

2. 李平:《国际技术扩散的路径和方式》,载《世界经济》,2006(8)。

3. 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的横向和纵向溢出效应》,载《世界经济》,2006(11)。

4. Aitken,B.and Harrison,AnnE.1999 .“DoDomesticFirms BenefitfromForeignDirect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 AmericanEconomicReview,89 (3) ,pp.605-618.

5. Smarzynska,BeataK.,2002 .“DoesForeignDirect InvestmentIncreasetheProductivityofDomesticFirms:inSearchof SpilloversthroughBackwardLinkages.” TheWorldBank: DevelopmentResearchGroupTrade,WPS2923.

6. Caves,R.,1974 .“MultinationalFirms,Competitionand ProductivityinHost-countryMarkets .” Economica, (41) , pp.176- 193.

7. Dunning,JohnH.,1993 .“TowardsanInterdisciplinary Explanation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JohnH.Dunninged., TheTheoryofTransnationCorporations.Routledge.

8. Eaton,JonathanandKortum,Samuel,1993 .“TradeinIdeas: PatentingandProductivityintheOECD.” Journalof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6, (40) ,pp.251-78.

9. Haddad,MonaandHarrison,Ann,1993. “AreTherePositive Spillovers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PanelData forMorocco.” 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93,42 (1) ,pp. 51-74.

10. Ginarte,J.C.and Park,W.G.,1997 .“Determinantsof PatentRights:aCross-NationalStudy .” ResearchPolicy,26 (3) , pp.283-301.

11. Kokko,Ari,1992. “ForeignDirectInvestment,HostCountry CharacteristicsandSpillovers.” TheEconomicResearchInstitute, Stockholm.

12. Kokko,A.;Tansini,R.andZejan,M.C.,1996 .“Local TechnologicalCapabilityandProductivitySpilloversfromFDIinthe UruguayanManufacturingSector.” TheJournalofDevelopment Studies,32 (4) ,pp.602-611.

13. McCalman,Phillip,2001 .“ReapingWhatYouSow:an EmpiricalAnalysisofInternationalPatentHarmonizatio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Economics,55 (1) ,pp.161-186.

14. Rodriguez-CarlA.,1996 .“Multinationals,Linkages,and EconomicDevelop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86 (4) ,pp. 852-873.

15. Yang,GuifangandMaskus,KeithE.,2003 .“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Licensing,andInnovation.” PolicyResearch WorkingPaper,No.2973 .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淄博 255049
(责任编辑:Q)

(上接第 59 页)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方面。

第三,政府应该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学研究表明,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缺陷,政府应在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上面对我国国家财政支出的分析来看,政府在这方面显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近年来,政府在修建铁路、高速公路和农村道路方面的投入已有了很大的增长,现在应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上来,并增加投入以加快城乡医疗体制改革,同时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对于加快市场化进程、增加居民的收入和安全感、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如前所述,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在我国的 13 亿人口中,有 8 亿是农民。可以说,如果“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则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农民的收入不能实现较大的提高,则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而且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因而,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一是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提高农业三项科技费用,三是改善农

民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四是增加农村救济费。同时,为鼓励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尽快对农民工实行“市民待遇”。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281,57、281、300,26~27、68、189,26~27、156、282、347,68、69,283,298,283、800、823、824,283、284,281、882,282、284,347 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 董宏君:《人大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断腐败分子后路》,载《人民日报》,2005-10-28。

2. 柳晓森:《四川省长张中伟:避免“拍脑袋”决策》,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4-06。

3. 世界银行:《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光盘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 Meier,GeraldM.andRauch,JamesE.,2005.Learning IssuesinEconomicDevelopment (eighthedi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p.441.

5. WorldBank,2004.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5:A BetterInvestmentClimateforEveryone.ACopublicationofThe WorldBankandOxfordUniversityPress,pp.258-261.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南昌 330013)
(责任编辑:N、S)